

父亲的高考之路

葛鑫

父亲常言，他的命运与1965年的夏日息息相关，那年他身经百战，终于踏上人生的一个重要舞台——高考考场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4次高考，犹如一场决战，决定了众多学子的未来命运。

父亲13岁起就一个人徒步30里地去县城上初中，不到一米四的小孩，每周背着煎饼走在山区的小路上，直到高中毕业。曾带兵打仗的爷爷一直鼓励父亲好好学习，走出大山。父亲也一直在咬牙坚持着。

最后决战的时刻，父亲为了备考，一个多月没有回家。那时住宿生不少，只有几位家在县城的同学走读。平时，住宿生都是每周六下午回家拿饭，周日下午回学校。临近高考，老师抓紧指导复习，同学们忙于做练习、写作文，反复熟读课本，周六、周日也都用在复习备考上。所以，高考前，大家都是准备好一个月的煎饼、咸菜，然后在学校学习。

有一次，父亲和一个名叫志强的好朋友在复习之余出去闲逛，顺便透透气。他俩在操场上溜达，围着操场的泥跑道转圈，不时地追逐打闹一下，对于即将到来的高考，他们心里懵懵懂懂的，充满了新鲜感，因为他们要到一百公里外的市里去考试，而且还要坐火车去。他俩玩累了就坐在树下休息，一边拿石子驱赶树上的麻雀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未来的大学时光。正在这时，教导主任突然站到他俩面前：“马上高考了，你俩不好好复习，在这里干吗？”他俩吓得魂都快掉出来了，马上灰溜溜地回到教室去复习。

去考试的时候，父亲他们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绿皮火车，大火车喘着粗气慢悠悠地跑，父亲兴奋地坐在窗前，看着外面的风景，早把高考的紧张抛到了脑后。

开考了，考场很安静，只有考生翻考卷的“沙沙”声和窗外知了的鸣叫声。开始考试，父亲才意识到，这是一场决定“穿皮鞋”还是“穿草鞋”的有关前途命运的考试，不知为何，父亲不仅不紧张，反倒有些小兴奋。父亲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兼数学课代表，成绩向来优异，加上平时也经常考试，也算是身经百战了。他心情平静地答题，考得很顺利，考题基本都会解答，只有数学最后一题没有做出来。

父亲当年的作文题是两题任选一题，一题是《谈革命与学习》，另一题是《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》，父亲选做了后题。因平时练习过类似的作文，所以思路流畅，感情饱满，一气呵成。

高考结束，父亲又和同学们一起坐上了慢悠悠的绿皮火车。回到家，奶奶给父亲煮了两个鸡蛋，犒劳他上学的辛苦。

高考结束至发榜有一个多月的时间，父亲家在农村，当时没有电话，消息闭塞。为了解信息，大约过了一个多月，父亲决定到学校去一趟，班主任看到他，说：“马上就开学了，你怎么才来啊，录取通知书都到了好久了！”父亲拿到通知书，多多少少有些小失望，他第一志愿报的军校，那时候，他一门心思上军校，以父亲当年的分数，上军校也绝对没有问题，可体检有一小项不合格给刷了下来。父亲最终被山东大学数学系录取了。

父亲成了所在公社的第一个大学生，这一消息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爷爷奶奶为他感到骄傲和开心，他们的付出和期望终于得到了回报。而父亲也深知，这一切都离不开自己多年的努力和坚持。



开往春天的火车
周文静 摄

三娘和放牛郎

龙婉嫣

三娘和放牛郎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夫妇，上到八旬老人，下至垂髫小儿，无一不知他们姓名。

放牛郎瞎了一只眼，那只瞎掉的眼睛总是半睁着，里面一片浑浊的白，再加上他总是龇牙咧嘴，让人一见便心里痒得慌。据村里老人说，放牛郎早些年还在放牛的时候，一次不知怎么惹怒了牛，那牛追着他在田埂到处跑，也就是那次，放牛郎在逃跑的途中摔断了腿，从此走路都是一瘸一拐。

也许你要问了：“那三娘呢？三娘又是因何而闻名的呢？”

三娘没有头发，也不知是自己剃了还是怎么的，头顶像一片从没开出过花的贫瘠土地。但三娘偏偏爱美，总戴着头巾，花花绿绿的，有时还在路边采几朵花夹在耳朵上。

外出求学后，我曾回过几次家，几乎每次都能看到三娘和放牛郎的身影。

有一天下了大雨，我和母亲坐在家门口闲话家常，看雨水不停拍打着地面，积水的地上激起层层涟漪。

就在这时，三娘出现了。她还是在光秃秃的头顶上围着头巾，穿着与季节不相符的衣裳，脚踏不知哪里偷来或是捡来的鞋。三娘在大雨中慢吞吞地走，看到我们时还招了招手。我慈爱的母亲问三娘：“这大雨你怎也不躲雨呀？”三娘立刻傻笑起来，连连摆手道：“不碍事儿，不碍事儿。”母亲又问：“放牛郎可在？他不跟着你？”三娘傻乎乎地笑，也不回答，只顾着往前走。

大雨自顾自下着，风吹着雨，雨幕被吹得斜斜的，快要落到家里来。正当我们准备回到家中关上大门时，放牛郎闯入了我们的视野。他胳膊下夹着一把收拢的雨伞，一只手遮着额头挡雨，目光直勾勾看向前方，步伐比平时看起来要快些，似乎是在追逐着什么。“走快些，三娘刚过去！”母亲说。放牛郎看了看我们，对母亲点点头。

关上门回到家里，我说：“放牛郎真傻，有伞也不知道打。”母亲说：“那伞肯定是给三娘的——不过放牛郎也轴，明明能撑着伞去追三娘的。”过了会儿，母亲又说：“别看他俩看着傻，心里明着呢，你说哪里找这么恩爱的夫妻去？”母亲叹了口气。

几年后，我打工挣了钱回家。“哟，回来了？”才开车到村里，一路上就有不少熟人向我们打招呼。“哎，回来了！”母亲立刻回应，我从后视镜看见母亲愉悦的神情。

时间好像拉回到从前，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，就好像我们离开前的日子按下了暂停键，等着我们回来继续似的。

母亲忙前忙后，跟老朋友们见面聊几句，拔去小院里的杂草，不亦乐乎。

村子似乎和以前没什么不同，但又觉得哪儿不一样。

“说起来，”母亲看着我问，“我们是不是没看见三娘和放牛郎？”

我这才恍然大悟，明明以往每次都能看见的他们，这下好像销声匿迹了，哪儿也没有他们的身影。

后来，我们才从村里的四姑那里听说了事情的经过，令人唏嘘不已。说是那天三娘在前面走着，放牛郎在后面跟着——就像往常一样。这时一只黑猫从树丛中窜了出来，正要被一辆轿车碾过，三娘救猫心切，冲了上去，不料自己恰被撞上，当场晕了过去。只叹放牛郎又是没钱又是没头脑，也不知道叫救护车，他们被人发现时已经过了不知多久，烈日炎炎，地上都是血，放牛郎就那么抱着三娘愣坐在路中间，身形佝偻。三娘那时已没了呼吸。人家问放牛郎这是怎么了，他也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，还是多亏了新装的摄像头，大家这才知道事情的缘由。

“那车主呢？车主怎么说也要负点责任吧？”母亲问四姑，眉头都皱成一团。

“唉！这你就知道了，”四姑凑近了母亲，小声道，“那可是有钱人家哎，不好惹，再说……”

母亲扬了扬下巴，示意四姑继续。

“再说三娘吧，毕竟脑子不太好，也就放牛郎和她在一起，别人都生怕和他们扯上关系，这你也知道……”

母亲便没了声音。

“那放牛郎呢？他去哪儿了？”我问。

四姑瞧了瞧我，似乎是在考虑要不要告诉我，最后，她回答道：“谁知道呢？有说他死了的，有说他去了别的地方的，反正是没人再见过他了。”

我于是也没了声音。一时间只听得到头顶的麻雀吱吱叫着。

“唉，这真是……厄运专找苦命人啊……”母亲摇摇头，感慨万千。

与四姑分别后，母亲还是沉浸在无奈与心酸中，她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三娘是个大善人啊……”

那天晚上，我怎么也睡不着，我心里感到无比愧疚。我愧疚，因为我曾私底下和玩伴们骂过三娘和放牛郎；我愧疚，因为我曾故意惹他们生气过；我愧疚，因为我曾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他们视为“恶人”。

夜，很黑，很寂静，我在黑暗中一遍遍描摹着记忆里他们的面孔：三娘顶着头巾，踏着不成对的鞋在雨中漫步，放牛郎胳膊下夹着收拢的雨伞，拖着残腿一瘸一拐地追上去。

